

# 禅宗研究的语用学维度

聂清◎

**内容提要：**目前禅宗研究呈现出语言学转向的轨迹，其中包含了从禅宗语义学研究向禅宗语用学研究的转化。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通过语用学对基于日常语言的禅宗文本进行分析具有特殊优势，他们大致从三个路径展开基于语用的禅宗研究：其一是以维特根斯坦为中心的前语用学分析，其二是以奥斯汀为中心的言语行为分析，其三是以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为主的禅宗会话涵义分析。这三种路径各有其针对的问题，也取得了相应成果，然而禅宗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并未真正完成。

**关键词：**禅宗 语用 言语行为理论 会话涵义

**作者简介：**聂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语言学转向是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研究重要转向之一。它的开端发源于哲学领域，其影响则拓展到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诸多学科并取得丰硕成果。在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前期试图通过严密的人工语言来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命题的困扰，后期则侧重于通过日常语言分析来呈现具体言谈所蕴含的意义。前者偏重于语义学分析，而后者着重语用学分析。语言学转向对各学科的影响，大多集中于日常语言现象，相应的方法更倾向于语用学分析。禅宗研究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成为显学，其研究方法不期然也经历了从语义分析到语用分析的过渡。然而禅宗研究中对于语言分析的采用通常缺少清晰的自觉，其语言学转向也尚未完成。本文通过对目前禅宗语用研究成果的归纳，试图勾画出禅宗研究中这一转向的初步轨迹，并对其进一步的脉络作简要梳理。

## 一、禅宗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二十世纪禅宗研究对语言的重视并非出于对语言学转向的认知，而是源于多种偶然因素的聚合。其一是敦煌文献的发现使诸多失传的禅宗典籍面世。无论是对历史研究、语言研究、文学研究还是宗教研究而言，敦煌典籍都如同取之不尽的宝藏，辨析文献语义成为此期最基本和最常见的工作。其二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白话文运动具有文化革新的意义，而恰好此时出土的敦煌白话文文献里面存有大量禅宗作品，于是禅典尤其是禅宗语录成为白话文以及俗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其三是考据方法在近代东方学术界大行其道，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开始摆脱传统禅宗对语言的忽视态度，而试图通过对经典的语义分析来获取更具有确定性的结论。这种研究风格一方面与西方的实证传统类似，另外也不乏乾嘉汉学研究模式在近代的延续，因此在禅学研究方法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四是基于对铃木大拙禅宗研究立场的反思。铃木大拙一贯断言禅宗无法通过思考和语言进行理解，从而反对基于实证性的禅宗研究。这种近乎独断的阐释特权引发了一系列反弹，其中包括入矢义高、柳田圣山等人通过基本文献诠释来理解禅宗的努力。<sup>①</sup>

以上诸多因素引发的禅宗语言研究，主要集中于词义诠释、句法分析、语法归纳、文献整理等语义学层面，其研究成果相当丰硕。龚隽对于语义层面研究方法的局限有清醒认知：

<sup>①</sup> 周裕锴：《禅宗语言研究入门》第一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由于过分相信新的史料所带来的富有革命性的创见，以历史文献为主而辅以必要思想解释的方法结构遂成为中国现代禅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新材料的发现，不能必然地带来方法论的系统省思和禅学研究的全面复兴。”<sup>①</sup> 新文献未必会带来新思想，一方面原因在于对文献的语义学解析不足以呈现文献所本有的复杂环境，另外则是忽略了宗教文献所拥有的特殊言谈模式。

关注文本关联的具体环境，是语用学不同于语义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与汗牛充栋的禅宗语义学研究成果相比，关注禅宗语言与使用者关联的语用分析，其成果寥若晨星。虽然该视野成果稀少，但其作用却不可轻视，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对于禅宗意义的重新诠释。禅宗研究的语用学转向与禅宗语义学研究的兴起都缘于对铃木大拙式禅学书写的反思，语义学研究针对的是铃木式的独断，而语用学转向主要是针对铃木的不可知倾向。语用学对于语言背景的澄清，是避免铃木式不可知论的重要工具。其中伯纳德·弗雷（Bernard Faure）关注禅宗文献与其背后宗派意识形态及权力的关联，可看作是摆脱铃木式神秘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结论貌似与胡适接近，但实际上他所借用奥斯汀（J.L.Austin）<sup>②</sup> 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禅宗分析的方法，已经完全不同胡适的实证模式。弗雷认为只有把禅宗命题重新放归到他所产生的历史场景中，才可能获得恰当的理解，已经具有清晰的语用学自觉。<sup>③</sup> 马克瑞（John R.McRae）更进一步取消了禅宗命题的真伪二元对立，试图从根本上超越胡适/铃木大拙模式，而促使我们反省禅宗命题在当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sup>④</sup>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我们不能把禅宗语言脱离其具体使用背景来看待，因此仅仅进行语义分析不足以揭示禅宗语言所具有的特殊涵义。葛兆光对禅宗的日常语言转向有清晰的表述：“当佛教思想在禅门中被日常化生活化之后，佛教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也恰恰有一个深刻的‘语言学转向’，……经典中的书面语言被生活中的日常语言所替代，生活中的日常语言又被各种特意变异和扭曲的语言所替代”。<sup>⑤</sup> 他明确指出历史上禅宗明确经历了日常语言转向，但是这种日常语言又带有禅宗的独特用法。无论是日常语言还是禅宗语言的特殊用法，其意义都远非单纯的语义分析可以涵盖。龚隽对传统禅学研究的语义学路径质疑道：“对文本的意义解读当然不能离开文字训释，但文字明是否一定达至意义明，并能实现正诂（规范的解释），这就不无疑问了。好比认得药方上的字，未必表明理解了药方的用法。语言文字学研究把重心放在语言的形式和结构上，往往忽略了作为说话行为的语言的实际生活、交往过程，即对话式的性质。”<sup>⑥</sup> 这段论述中，龚隽通过药方文字和医理之间的巨大差异来比喻禅宗文本与禅意之间的鸿沟，然后引出言语行为、会话涵义、会话背景等重要语用范畴。

简要而言，虽然从语义的角度阐释禅宗获得了很多成果，但其成果对于呈现禅宗意义的作用不能高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语言学和禅学两个角度不约而同地试图通过禅宗语用研究来进一步挖掘禅宗本有的内涵。这种禅宗的语用学转向大致集中于如下三个方向：其一

① 龚隽：《禅史钩沉》“导论”，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② J.L.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Press (1962)。

③ 伯纳德·弗雷主要相关著述为：*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和 *The Will to Orthodoxy: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Northern Chan Buddh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马克瑞：《审视传承—陈述禅宗的另一种方式》，关则富译，《中华佛学学报》，2000年第13期。

⑤ 葛兆光：《语言与意义——九至十世纪禅思想史的一个侧面》，《新国学》第1卷，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版。

⑥ 龚隽：《禅史钩沉》，第443—444页。

是以维特根斯坦为中心的前语用学分析，其二是以奥斯汀为中心的言语行为分析，其三是以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为主的禅宗公案分析。

## 二、前语用学阶段的禅宗思考

语用学是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严格来说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创刊才算是真正成立。但语用学的思考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马林诺夫斯基通过人类学研究观察到语言意义与其语境息息相关，莫里斯则明确将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界定为语用学。至于从哲学层面上探究语用对于思考之意义，则不可忽略维特根斯坦所起到的作用。很多关于禅宗的语用学研究，接近或者是基于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语用学基本立场，但又尚未结合语用学的具体原则，可算作是前语用学阶段的禅宗思考。

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更关注日常语言，与禅宗侧重日常体悟的立场有很多契合之处，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他早期的观点也同禅宗有密切关联。王海东等人认为早期维特根斯坦为思想设立界限，与禅宗不立文字的观点如出一辙，都表现出对不可说的形而上存在保持沉默的态度。<sup>①</sup>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禅宗确实对于思想、语言能否通达佛性持否定态度。这种对语言局限性的警觉是禅宗不立文字的重要动机之一，但并非全部。因为在禅宗的历史上对于语言的运用并不罕见，历代禅师语录数量之巨使其成为诸多佛教派系中文本最多的一支。摒弃一切语言和思虑的“默照”禅法，反倒一度被禅宗主流批驳为邪道。显然对于禅宗“不立文字”的观点，不能仅理解作对语言局限性的认同。

对于禅宗和语言关联性的解释，结合维特根斯坦后期观点更有成效。陈海叶提出可以从维特根斯坦语用观念来解说禅宗的思想<sup>②</sup>：一则，后期维特根斯坦已经具备对语境的思考，而禅宗传授时的具体语境是我们了解禅宗的重要元素；再者，语言游戏消除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这样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禅宗“不立文字”的观点。后期维特根斯坦倾向于从使用的角度来解说意义的生成，虽然“使用”是个过于宽泛的概念，但毕竟揭示了与以往语言观念不同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之下，语言和文字的意义不再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固定摹写，而取决于其具体的灵活使用方式。如此以来，禅宗表面上不合情理的表述方式都获得了身份上的许可。禅宗的语言并不是在诉说不可诉说的神秘，而只是特定群体在进行的特定“语言游戏”。文中还指出了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与禅宗“平常心是道”的类似，同样认为可以通过还原对话者存在状态来解释禅宗语言意义。

霍韬晦也认为，在排除极端怀疑论立场之后禅宗语言必定有其意义，关键在理解其如何传达意义。<sup>③</sup> 对于禅宗语言的理解，一个角度是指称论，认为语词有特定的指向对象与其相符的实证主义立场。另外一个角度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通过使用来呈现语词意义的语用立场。霍韬晦特别指出语言的运用并非任意，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语言游戏”强调使用必须遵循特定的规则，那么禅宗语言的理解也必须依据其特有的规则才能确立。从这种角度看，认为禅宗话语依据于某些私人感悟的观点，是对语言本有的主体间性的忽视。以此推知，铃木大拙认为禅宗语言的意义基于个体化经验的观点，恰好是维特根斯坦极力批驳的“私人语言”错误。

结合维特根斯坦思想考察禅宗语言，最大的收益是确立了禅宗语言的合理地位。铃木大

① 王海东：《寻道之路：“不可说”与“不立文字”——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禅宗思想之比较》，《学术探索》，2013年第3期。

② 陈海叶：《禅宗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语用诠释》，《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③ 霍韬晦：《禅的语言——兼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比较》，《禅学研究》第6辑。

拙将禅宗语言神秘化，未尝不是为了避免来自实证主义的潜在威胁。但是他又无意中引入了实证主义的预设，认为禅宗语词的意义在于与某种特定经验的对应。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作用，就是破除实证主义对于语言意义的狭隘断定。就如同我们不能把形而上命题简单理解作无法证伪的非胡言乱语，貌似非理性的禅宗表述同样具备解释上的可能。研究者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使其免于实证主义攻击而将它关入神秘主义牢笼，日常语境中有足够的解释空间供禅宗语言安全展开。

### 三、禅宗言语行为现象分析

虽然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是语用学最有启发性的源头之一，但他诸多相关命题更倾向于宏观的论述，而对于具体语句的意义生成尚未提出可资遵循的原则。因此，借助其观点进行的禅宗语言解说，还不足以呈现具体禅宗命题所拥有的丰富内涵，有时甚至会退回到了铃木风格的悖论式表述。这种情况迫使研究者不得不更进一步，借助成熟的语用学原则来分析禅宗命题的涵义。而语用学最早确立的基本原则，就是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

较早借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禅宗命题的是弗雷，他充分意识到语用视角对理解禅宗的重要意义。<sup>①</sup> 他一方面反对传统的族谱式禅宗史观，另外也不赞同胡适将禅宗理解作谎言的堆积，而主张以“行事的”(performative)方式来解读禅宗文本背后蕴藏的背景。弗雷所谓“行事的方式”论述不乏德里达的观点，但毕竟奥斯汀对“行事表述”(performative utterances)有更为系统的阐述，所以通常将其观点视作语用学角度的禅宗研究。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书中开篇就提出了行事表述与陈述表述(constative utterances)的不同：行事表述不涉及真伪，且其意义与其使用环境有关。弗雷借助这一观点，将禅宗语言从真值判断中解放出来：虽然它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这丝毫不妨碍禅家话语具有意义。只要我们将其置入恰当的环境，禅宗表述的意义会充分呈现出来。

霍永寿追随弗雷的观点，同样认为行事表述在理解禅宗语言中占有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基于弗雷，但更进一步深入到言语行为的具体原则。事实上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后半部分，放弃了前面提出的“行事\陈述”的二分法，而代之以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的三分法。<sup>②</sup> 在成熟的言语行为理论看来，无论是行事表述还是陈述表述都是语言行为，只是从行为的分类上看可以分为三种。霍永寿认为在禅宗话语意义的生成过程中，语义内容乃是其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的障碍，禅师通过阻断受话人的语义诉求而将其引向语用层面，从而实施语言的行事。霍永寿关注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原则对于理解禅宗语言的作用，是禅宗言语行为研究的重要推进，初步摆脱了弗雷设定的二分式考察框架。

聂清开始采用三种言语行为模式来解析禅宗具体命题。<sup>③</sup> 他通过对“即心是佛”公案的分析表明，有些表面上看来是以言表意的禅宗话语，实际上隐藏的是以言取效行为。与传统言语行为理论偏重于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s)不同，聂清更侧重于禅宗言语行为中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的分析。他认为禅宗各个派系的风格差异，并不在于其思想分歧而是其以言取效模式的不同。而禅宗传承中对于权威的构建，目的是为了增强语用效力(Illocutionary force)而给以言取效行为足够支撑。

将禅宗语言仅仅划归为行事表述仍旧是一种被动的保护策略，只是赦免了禅宗语言的非

① 参见弗雷：*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第四章和第七章。

② 奥斯汀的概念原文分别为：Locutionary acts；Illocutionary acts；Perlocutionary acts。

③ 聂清：《禅宗中的言语行为》，《佛学与国学——楼宇烈教授七秩晋五颂寿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法身份。结合奥斯汀的三种言语行为原则，则可以对禅宗的话语模式作进一步的正面解说。以上成果只是对此作了初步尝试，结合更细致的言语行为分析其研究潜力才会充分展开。

#### 四、禅宗公案的会话涵义

传统佛教单向的宣教模式在禅宗中相对少见，禅宗使用语言的主要方式是往返对话，这种对话概称为“公案”。既然以法律名词“公案”命名，说明禅宗会话蕴藏在表面语义之下的内涵需要破解才能明了。而鉴于对话这种交互形式，那么从语用交往角度来探察禅宗会话涵义就成为合理途径。相比于侧重个体言说的言语行为理论，注重会话分析的合作原则、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更便于呈现禅宗公案的内涵。

但号称教外别传的禅宗会遵循“世俗”的交往原则吗？钱冠连认为这些交往性原则对禅宗公案无效。首先他认为合作不必是原则，因为它无法解释禅宗会话中大量的不合作现象。其次，禅宗公案是超乎常规的语言现象，其意义源自于个人的独特意境。用通常的逻辑模式去理解禅门对话，在传统禅学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举措。<sup>①</sup>唐姿支持钱冠连的这一立场，她认为禅宗会话中对格莱斯合作原则的违反，体现中国语言哲学超越西方逻辑局限和以理性为中心的独独特意义。<sup>②</sup>

陈家春则显然不赞成钱冠连的观点，他认为把禅宗语言看作不可解析而纯粹靠领悟的研究方法，或者认为禅宗语言不能用一般语言理论分析的观点，都是因为没能准确地区分研究者和参禅者的身份而导致的误区。<sup>③</sup>尽管禅宗语言表现得比较特殊，但它仍是一般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禅宗交际也是普通交际的一个类别，因此它可以用一般语言理论进行解读。陈家春借助由斯珀波（Sperber, D.）和威尔逊（Wilson, D.）提出的以认知语境为基础的关联理论来解读错综复杂的禅宗语言。<sup>④</sup>他认为禅师的机锋语言和动作，其实就是各种刺激讯号，尽管这些刺激讯号在外行看起来完全不可理喻，但实际上总是跟禅宗教义之间有某种既定的关联。

相比较而言，承认禅宗公案依然遵循会话原则的研究者更多一些，他们认为禅宗公案表面上对会话的否定蕴藏了更深层的建设性交谈。张园园以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的语言适应论（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为理论框架，将禅宗会话中的否定看作适应禅宗会话语境因素的语言策略。<sup>⑤</sup>她指出造就否定性言语行为的语境缘于禅宗反二元对立的理论背景和禅宗“以心传心”的师徒关系。高艳华则借用关联理论为基础，指出禅宗公案中的间接否定应被视为使话语达到最佳关联的语用策略。<sup>⑥</sup>禅师们之所以选用间接否定作为最佳关联化语用策略，就在于间接否定的运用使得听者在话语含义的获取方面承担相当大的责任，这一效果与禅宗提倡的“自性自悟”引导原则相辅相成。张园园的文章主要解释了禅宗会话模式对其心智环境和社群环境的适应，而高艳华的文章则更进一步指出了禅宗的否定式会话对其会话目标的积极趋近。

通过对禅宗公案的会话分析，一方面彻底肃清了针对禅宗语言的不可知立场，另外更细

① 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② 唐姿：《从对格莱斯“合作原则”的违反谈禅宗公案中的语言哲学》，《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③ 陈家春：《禅宗交际新解》，《江淮论坛》，2017年第5期。

④ 参见：Sperber, D. & D. Wilson (1986/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⑤ 张园园：《禅宗会话中否定性言语行为的语用学研究》，《浙江外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⑥ 高艳华：《禅宗机缘问答中间接否定的语用学研究》，《浙江外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致地解释了禅宗为何采用如此特别的会话模式，进一步还解说了禅宗会话模式所带来的特殊认知效应。可以说，会话涵义领域是目前禅宗语用研究成果最丰厚的一支。

## 五、禅宗语用研究的限度与潜力

虽然目前从语用学各个角度对禅宗展开了研究，但是该研究领域目前来看还是非常薄弱，禅宗研究的语用学转向远未完成。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禅宗义理研究没有给禅宗语言研究提供足够有力的理论支撑。邢东风曾经指出过禅宗研究和语言学研究分立带来的弊端，禅宗研究者忽略文献解读中的语言问题，而语言学者不明确禅宗的具体宗教实践。<sup>①</sup>他所讲的语言问题还主要是语义问题，这个问题随着禅宗语词工具书的增加而逐步缓解，但禅宗的语用问题依然没有引起禅宗研究领域的足够重视。指责语言学者不了解禅宗的具体实践有些勉强，因为即便是专门研究禅宗的学者对禅宗实践也尚未达成共识。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禅宗语言的使用环境尚不明确。虽然我们有很多解释禅宗的理论，包括最早的主观唯心和客观唯心理论框架，随后引用的大乘三系说，再到后来的禅宗文化论，乃至目前热门的观念\权力分析等，但没有一种可以赋予禅宗语用以足够清晰的理论支撑。迄今为止，禅宗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成果尚不足以给细致的禅宗语用分析提供有效的背景性说明。

但我们不应该在此障碍之前裹足不前，因为禅宗语用研究有其不得为之处。这既关涉到禅宗本有的语言模式，也涉及到我们对禅宗思想意义的呈现。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基本事实：虽然禅宗早期借用了《楞伽经》、各种《般若经》，而中后期倚重于《圆觉经》《楞严经》，但日常会话才是禅宗的基本语言构成。在禅宗会话中，最重要的不是对佛教专有概念的界说，而是对日常语句的灵活运用和创造性领悟。禅宗历史上并非没有侧重语义的辞书，如北宋陆庵善卿《祖庭事苑》、明代梁溪《禅林宝训音义》、日本江户时代无著道忠《葛藤语笈》《禅林象器笈》都属禅语辞典类著述。<sup>②</sup>但是这类著述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传统禅林中均未受重视，因为这类著述恰好将口语化的禅宗会话重新转化为概念明确的人工语言，这会导致禅宗语言脱离与其使用环境的密切关联而失去活力。固然禅宗研究不同于参禅，但禅宗研究要尊重禅宗本身偏重于日常语言的基本风格，唯有通过语用学才会更有效地揭示这些会话所蕴藏的丰富内涵。

如此以来我们似乎处于僵局之中：一方面语用学角度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禅宗不可或缺，另外一方面对禅宗的语用学解说因为缺少来自禅宗理论方面的研究而无法深入。其实这种僵局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动力，禅宗语用学研究对具体思想背景的需求可以倒逼禅宗理论研究提供更契合实际禅宗语言使用情境的解说。禅宗原理研究中的偏颇可以通过语用学的需求而得以纠正，而理论研究中的空疏则可以通过语用学细则的引导而逐步深入，最终在理论预设和实际话语间生成建设性的语用学循环。如此以来，学科跨越对禅宗语用学研究就不是障碍，而是拓展禅宗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机遇。

(责任编辑 周广荣)

① 邢东风：《禅宗语言问题在禅宗研究中的位置》，《俗语言研究》，1996年第3期。

② 周裕锴：《禅宗语言研究入门》，第3—9页。